

对卡尔·维克意义建构视角的述评^{*}

□ 蔡崧吟 刘潇肖

领域编辑推荐语:

“卡尔·维克的意义建构视角对管理学多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回顾了意义建构视角的发展脉络，剖析了其认识论、方法论立场，对后续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赵雁飞

摘要: 组织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变动性与日俱增。个体、团队、组织需要快速应对突发事件、新形势。在此背景下，意义建构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本文回顾了美国管理学者卡尔·维克对意义建构的提出与发展，梳理了后续研究的新进展。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剖析意义建构视角的思想渊源，分析其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以及诠释学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本文认为，由于维克未明确阐释其哲学立场，使意义建构视角并未脱离身心二元论，并忽略了身体体验在意义生成与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最后，维克对生成、涌现等动态过程的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意义建构；生成；身体；卡尔·维克

“我们最好的向往是人们会更关注脚下的大地。”

“The best we can hope for is that people will look more closely at the
ground beneath them.”

——Karl Weick, 1969, p. 109

一、研究背景

当今社会处在“VUCA”时代，极端天气频发，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同时，企业内部员工的多元化程度增强，跨文化团队、虚拟团队等面临的挑战也日渐凸显。管理

^{*} 本文受到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0J05013）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以及编委给予的宝贵修改建议。感谢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李卫东教授在本文写作、修改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以及郭艳婷助理教授对本文表述方面的建议。

者如何建构、应对内外部环境、事件与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受到管理学者的长期关注（鲍勇剑，2016；李平，2016）。美国学者卡尔·维克（Karl Weick）早在半个世纪前的著作《组织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1969）就阐述了行动与意义的关系，审视不确定环境下个体如何感知与行动，关注组织的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结构。维克提出“意义建构”（Sensemaking）这一概念，意指组织中的个体在面临意料之外或模棱两可（Equivocality）的情况下，寻求意义澄清的过程（Weick et al., 1995）。意义建构视角侧重环境感知与行动的相互作用，试图打破决策与理性模型对组织理论的钳制（Weick, 1988）。维克关于意义建构的理论化过程及思想演变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意义与行动的认识，也促使管理学者反思管理实践中的活动、时间性、流动等议题（Langley et al., 2013；Glynn & Watkiss, 2020）。

意义建构视角对管理学、人机交互以及信息科学等领域都有深远影响（车晨等，2016）。在管理学领域，意义建构已应用于战略变革（Gioia & Chittipeddi, 1991）、危机管理（Gephart, 1993）、组织学习（Calvard, 2015）等方面，在即兴发挥与创造力（Drazin et al., 1999）、创业过程（熊文明等，2021）、企业社会责任（齐丽云等，2021）等研究中也有所应用。维克的研究对管理学、心理学、组织学具有重大贡献，也影响了诸如彼得·圣吉（Peter Senge）、阿里·德赫斯（Arie de Geus）等管理学者。

尽管意义建构研究已引起广泛关注与应用，但其概念的内涵以及维克提出意义建构的哲学立场有待厘清。首先，将“sensemaking”翻译

为“意义建构”在中文语境下容易产生歧义，梳理意义建构的内涵及其背后的科学哲学立场有助于后续研究深入理解、正确运用意义建构视角。有研究者将意义建构特指为意义（meaning）的产生与传递，侧重于共识达成（臧志、沈超红，2011）。然而，sensemaking并非指抽象的意义（meaning）或意义感（meaningfulness），而是一种复杂的、持续的生成（Enactment）（Gephart et al., 2010），由模棱两可的事件或环境触发，通过个体的解释、行动、互动、身份认同建构等过程，对现实进行信息加工与建构。曾有研究者将sensemaking译为“建构感知”（鲍勇剑，2016）。由于“意义建构”的使用更为广泛，本文仍采用这一译法。

其次，受过心理学训练的维克在其关于意义建构的著作与论文中，并未明确阐述其哲学立场。从现有关于意义建构的定义与理论演变来看，本文推断维克是基于杜威经验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但并未脱离笛卡尔主义的身心二元论，忽略了身体体验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Weick, 2020）。欧洲管理学界顶级期刊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于2020年发表了“意义建构”提出五十周年的纪念专刊。其中收录的一篇文章从直觉入手，考察在电影摄制组中的意义建构，明确指出情感与身体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Meziani & Cabantous, 2020）。维克对此做出回应（Weick, 2020），反思了身体与体验为何在意义建构的理论化中缺席，将在本文的讨论部分详细阐述。

综上，本文旨在系统回顾意义建构视角的发展脉络，尝试剖析意义建构暗含的认识论、方法论立场，探讨一直被忽视的“身体”与

“体验”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 (Weick, 2020),

二、意义建构视角的发展脉络

(一) 意义建构：内涵与发展

卡尔·维克被誉为“意义建构之父”(Ancona, 2012), 对意义建构的提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每位研究者的思想与哲学立场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与主体性思考(黄光国, 2006)。基于此, 有必要回顾维克的学术生涯, 并尝试分析其视角的渊源与局限。

维克出生于1936年, 于1962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 继而在普渡大学心理系任教。维克曾为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出版的组织手册撰写实验和组织的章节, 从而确立了其组织心理学家的身份(Eisenberg, 2006)。心理学的教育背景使维克从心理学视角思考动态环境下的组织, 为意义建构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在组织研究中, 如何认识和研究组织是管理学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传统的组织理论(如古典管理理论、人际关系理论、系统理论等)将组织视为静态的结构, 将组织成员的互动参与看作组织结构运作的产物, 认为组织中的经验和知识可以通过研究者进行解释和预测(罗珉, 2009)。1969年, 维克将意义建构(sensemaking)的概念引入组织研究中, 使研究关注点从静态的组织结构(organization)转向动态的组织过程(organizing)。维克认为组织成员通过互动建构了组织(Weick, 1969), 静态的组织(organization)是组织过程(organizing)动态演化的产物, 是“组织化”留下的可操作

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启示。

的形象(operative image)(Weick, 1979), 以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的形式表征在组织成员的脑海中(Weick & Bougon, 1986)。

维克在著作《组织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中提出行动者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互动交换使生成的内容得以选择和保留(Weick, 1969), 而组织(organizing)是环境变化—生成—选择—保留的循环反馈过程(见图1)。具体而言, 环境变化是意义建构的来源, 调动了组织成员对环境变化的感知。生成(enactment)是意义建构中的重要概念, 关注组织成员自身在创造环境中的积极作用。生成是指成员通过行动将变化分离出来, 进而产生结构、约束和机会的社会过程, 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环境变化(Weick, 1988)。选择指个体基于认知结构和过往经验筛选模糊信息, 试图减少模糊性, 而选择既可能有助于合理解释发生的事情, 也可能进一步增加模糊性。保留是指将意义建构的产物保存下来, 从而合理解释模糊性。基于此, 意义建构与组织过程(organizing)两者相互渗透(Weick, 1969; Weick et al., 2005; Sandberg & Tsoukas, 2015)。当研究者就“组织”向其成员开展调研时, 成员头脑中留存的是记忆中的组织及其身在其中的经历, 而不是某个静态的组织(organization)。

(二) 行动与身份认同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维克在表述意义建构的概念时, 曾以两个单词(sense making)表达(Weick, 1976), 后于1979年改为两个单词相联的形式(sense-making), 而后于1995年改为sensemaking, 以强调行动与意义的互依性, 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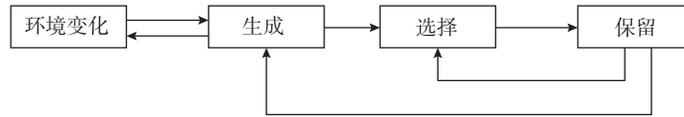


图1 组织过程 (organizing) 与意义建构的关系

资料来源：整理自维克《组织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1979年第二版)。

对两个词的内涵分别理解而偏离概念的本义 (Weick, 2016; Glynn & Watkiss, 2020)。在概念命名的变化中，维克更强调行动与身份认同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

意义建构往往被误认为认知层面的解释过程 (Weick, 1995)，而实际上，维克强调行动是意义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环境的变化，个体通过意义建构使事件逐渐清晰化后，并不会停止意义建构过程。此时，个体面临如何进一步行动的问题，并通过行动和观测来了解环境。Weick (1988) 认为，“认知在行动的道路上。行动先于认知，聚焦于认知”，人们可以通过行动来快速产生更多线索，行动也可以验证先前的意义建构所产生的理解。因此，行动和认知不断迭代：行动为后续意义建构提供原材料，同时为先前的意义建构提供反馈。此外，行动塑造了意义建构的环境，个体可以通过行动作用于环境，从而改变了最初触发意义建构的环境 (Weick et al., 2005)。维克关于“行动可以先于意义”的观点颠覆了“计划先于行动”的传统看法，催生了组织变革中意义建构的民族志研究 (Gioia & Chittipeddi, 1991)。

早期基于意义建构视角的研究强调个体可以运用知识结构加工信息 (Starbuck & Milliken, 1988)，尤其是在变革与危机情境下。维克认为，理解意义建构在危机中的作用，有助于在

危机初期及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避免更大的损失 (Weick, 1988)。基于意义建构视角，维克通过对历史档案等文本资料的分析，探究曼恩峡谷火灾中消防员团队崩溃的原因 (Weick, 1993)，发现意义建构停止或被打断会导致组织的解体、崩溃。维克认为，消防队员到达火场后，发现险情远比之前相对乐观的估计更加迅猛，突然转变的风向也使团队成员身陷火海、不知所措。当幸存者 Dodge 号召大家放下灭火设备、放火烧出逃生圈时，团队成员无法处理这一意外情况，无法放弃意味着消防员身份认同的灭火设备，而在狂风与大火蔓延的紧急情况下四散奔逃。意义建构的崩溃导致团队瓦解，酿成 13 名消防员牺牲的悲剧。

维克在后续专著中提出意义建构的七个重要属性 (见图 2, Weick, 1995; Weick et al., 2005)：①基于身份认同的建构 (grounded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②回顾性 (retrospective)；③生成性 (enactive of sensible environments)；④社会过程 (social-sharing meanings or viewpoints)；⑤持续进行 (ongoing - continuous)；⑥线索提取 (extracted cues)；⑦合理性 (plausibility)。其中，身份认同塑造了组织行动者意义建构生成和解释的方式 (Gephart, 1993; Weick, 2012)，并会影响组织内部其他成员或外部利益相关者看待个体的方式，进而削弱或

强化身份认同 (Weick et al., 2005)。当身份认同、社会背景和线索变得模棱两可时, 意义建构的回顾变得更加困难, 使个体难以界定正在

发生的事件, 甚至会引发意义建构的崩溃 (Weick et al., 2005; Sandberg & Tsoukas,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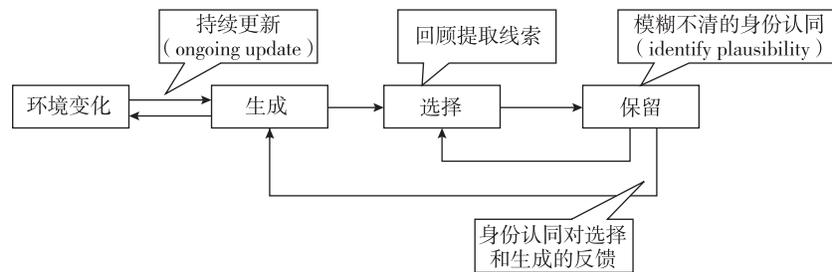


图 2 组织过程 (organizing) 与意义建构的关系

资料来源: 整理自 Weick 等 (2005)。

意义建构依赖于个体过去的经验 (Weick, 1993), 组织成员在互动时所使用的语言与文字、观察时所使用的范式, 会受到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自身的生活经验等因素影响 (卡尔·韦克, 2010)。例如, 在对医护人员意义建构的分析中, 维克认为护士对患儿的注意 (noticing) 和经验筛选 (bracketing) 活动是基于她们之前在工作、培训和生活经验中所积累、获得的心智模式 (Weick et al., 2005)。在具体情境中, 个体带有自身预设的观点、立场与身份认同, 并随着环境的变化发生相应改变。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对

环境的建构和理解, 并塑造了后续的行为和解释, 影响其他成员如何看待自身的形象和对待自身的方式 (Weick et al., 2005)。维克进而提出意义建构具有反身性, 意义赋予的过程会影响赋予者和目标 (Weick, 2005)。对意义建构思想的发展及演变可参见 Glynn 和 Watkiss (2020)。

(三) 影响与新进展

继维克提出意义建构的概念后, 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意义建构进行界定 (见表 1), 强调了个体通过行动和语言对环境与事件进行建构并达成主体间一致性的过程。

表 1 不同学者对意义建构的界定

提出者 (时间)	定义
Weick (1993)	个体对发生的不确定事件进行解释并合理化, 并回顾性地建构所面临的环境, 从而持续不断地生成现实
Gephart (1993)	建构和解释社会世界的话语过程
Weick (1995)	意义建构是一种过程, 受到以下属性的影响: 身份认同、回顾性、生成性、社会过程、持续进行、线索提取, 合理性
Balogun & Johnson (2004)	是对话性和叙事性的过程, 人们通过这一过程创造并维持其主体间世界

续表

提出者 (时间)	定义
Weick et al. (2005)	由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的身份认同引发, 从环境中提取线索, 回顾性地建构, 并在环境中生成秩序
Gephart et al. (2010)	通过面对面的对话和非言语行为, 寻求、产生、谈判和维持主体间意义, 以创造主体间共享意义的持续过程
Näslund & Perner (2012)	当组织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 其成员以故事作为理解这种变化的手段, 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标记和分类
Maitlis & Christianson (2014)	由违反期望的事件所触发, 包括关注和经验筛选/悬置 (bracketing) 环境中的线索, 通过解释和行动的循环创造主体间的意义, 从而生成一个更有序的环境, 从中得到进一步的线索

资料来源: 笔者整理。

由于组织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以及重大外部事件的突发性日渐凸显, 组织成员如何从环境中提取线索、解读并建构意义成为管理学者关注的问题。意义建构视角逐渐应用于危机管理 (Weick, 1988; Hart, 1993; Gephart, 1993)、战略变革 (Gioia & Chittipeddi, 1991)、创新 (Hill & Levenhagen, 1995; Drazin et al., 1999) 等领域, 涉及个体、团队、组织等多个层次。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个人如何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提取线索、感知现实, 形成对事件的解释并采取行动。有研究考察了高层管理者、中层管理者、员工在意义建构上各自的特点 (Gilstrap et al., 2015; Klein & Eckhaus, 2017; Rouleau, 2005)。团队层面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团队成员之间如何对事件解读并产生认知共识与共享意义, 发现成员对身份认同和形象的认知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Combe & Carrington, 2015; Gioia & Thomas, 1996; Guette & Vandenbempt, 2013)。组织层面的研究考察了意义建构如何促进集体行动, 提升危机应对、组织学习等组织能力, 以及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Calvard, 2015; Kornberger et al., 2018; Thomas et al., 1993; 尚航标等, 2014)。对于组织外部的宏观制度环境, 由于意义建构研究强调微观的心理过程, 如何将意义建构与制度

环境进行结合成为难点。目前已有学者开始探索制度环境如何嵌入意义建构 (Weber & Glynn, 2016; 魏玖长, 2017)。

在意义建构的基础上, 有学者延伸出其他相关概念, 如意义赋予 (sensegiving, Gioia & Chittipeddi, 1991)、意义解构 (sensebreaking, Pratt, 2000)、意义交换 (sense - exchanging, Ran & Golden, 2011)、意义隐藏 (sensehiding, Vaara & Monin, 2010) 等。这些研究拓宽了意义建构的研究领域, 关注认知以外的因素对意义建构的影响, 例如成员在社会情境中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 (Gephart, 1993; Weick et al., 1995)、身份认同建构 (Weick et al., 1995; Maitlis, 2005)、沟通与对话 (Hill & Levenhagen, 1995; Balogun & Johnson, 2004) 等。其中, 意义赋予指成员通过行动影响他人的意义建构, 强调不同个体之间意义建构的影响过程, 意义建构和意义赋予两者在组织成员中交互循环发生。意义赋予将意义建构研究的关注点从个体内部扩展到成员之间的互动 (Gioia & Chittipeddi, 1991)。值得注意的是, 意义解构、意义隐藏的内涵更偏向于“意义感” (meaning), 而非维克原本提出的“感知” (sense)。造成这一概念的偏移或许在于对意义建构视角的哲学立场缺乏共识。基于此, 下文试图挖掘意义建

构视角的哲学基础。

三、思想渊源与哲学基础

(一) 杜威经验主义的影响

在回顾自身思想的发展时，维克提到深受美国学者杜威与詹姆斯的影响，重视体验与理解之间的关系（Weick, 2020）。杜威拓展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并对改造认识论与社会提出独到见解。詹姆斯则对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心灵哲学、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杜威的激进经验主义思想（塔利斯, 2019），不难看出维克意义建构的思想根源。

首先，意义建构始于对经验的认识与意义的生成。在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看来，经验是一种系统性的欺骗，而理性能力是知识的源泉。现代哲学的争论主要涉及经验的认识论价值。以往经验主要被视为一种认识事件。但在杜威看来，“经验是活的，是一种生命现象，而不是一种认识现象”（塔利斯, 2019），经验本身意味着它“首先是一种行动的事件”，是生命与环境中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互动的连续过程，而情境指的是“周围的被经验化的世界”。基于此，杜威倡导的认识论试图打破二元论下关于“内在”要素与“外在”表现之间的割裂，重视动机与行为的连续性以及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

这一思想在维克关于意义建构的过程模型中得以体现（见图1），认为行动者可以通过生成、创造或建构环境，而不是由其他人创造（Weick, 1969）。可见，在认识论立场上，维克

持有建构观，主张知识是由人们通过持续不断的意义建构过程，在互动和沟通中形成共同意义，一种情况在互动中“被谈论”成为存在，并为行动者奠定了行动基础。

除了杜威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影响，詹姆斯关于情绪与生理反应孰先孰后的讨论挑战了传统的情绪观，并开始关注身体在心理活动，尤其是情绪体验中的重要性。然而，詹姆斯对情绪与行动的观点在意义建构中并未得以充分体现。

(二) 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

通过分析意义建构的内涵及其演变，本文认为意义建构是基于唯名论（nominalism，或称为“相对主义”）的本体论、主观主义的认识论以及诠释法的方法论（黄光国, 2006）。首先，意义建构与组织过程的关系体现了基于唯名论的本体论。西方哲学概念中的本体论主要探究何为世界的本原。唯名论认为，“实在”并不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每个个体的生活世界都是不同的。Weick（1979）认为，现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环境是由人们自身创造的。基于Weick的动态组织观，在意义建构的视角下，组织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个体所建构的过程，并深受社会互动的影响。此外，管理学者曾荣光（2020）回顾了九种管理学顶级期刊发表的50篇文章，提出四种常见的哲学观点：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批判实在论与实用主义。对比这四种哲学观点对应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维克的意义建构论更符合实用主义，即在本体论方面，认为“存在客观现实，强调人类体验的内在世界在行动中的作用”；在认识论方面，认为“概念和理论是解决人类问题的工具，而非对现实的表征；真理表现为应

对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曾荣光，2020）。以动态组织观为例，维克认为组织并不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对象存在物，而是在成员社会互动中主观建构呈现出来的；并且建构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受个体的经验、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可见，实用主义对应的本体论调和了唯名论完全否认“客观事实”存在的观点，同时也强调主观建构与体验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

近年来，维克更为关注语言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将语言视为行动的语言，认为思想、行动、语言之间具有一体性并相互影响（鲍勇剑，2016）。维克认为，语言在组织成员生成和建构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基础作用，语言是意义建构的原材料（Weick et al., 2005; Sandberg & Tsoukas, 2015），意义建构这一过程可阐释为“流动→直觉→词语→行动（Flux → Hunches → Words → Action）”（Weick, 2020）。维克对语言作用的重视可以从这一表达中窥见一斑：“未见吾所言，怎知吾所想？（How can I know what I think until I see what I say？）”（Weick, 1995）。语言对行动的影响体现为意义建构的回顾性特征（retrospective），个体所使用的语言会显示出此刻的存在状态，以及未来的行为特征。例如，维克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曼恩峡谷火灾中，如果消防员的沟通选择使用“这是场逃生为上的大火”，而不是说“熄灭这场火，小菜一碟”，那么他们在火场中的行为或许会改变，在逃生中更有可能选择放下沉重的灭火装备（鲍勇剑，2016）。

基于以上分析，意义建构侧重于解释个体对社会、组织现实的建构，因而在认识论上体现了主观主义的立场，关注人的主观经验与解

释。要理解个体的行为，需要从行动者的角度出发。行动者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行为主体，而是根据内在信念价值与概念框架对现实世界进行解读与决策。

（三）基于意义建构视角的方法论

研究者的方法论立场会影响其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胡玲和金占明，2007）。基于意义建构的视角，组织是由行动者所建构的，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与动态性，包含着个体的认知、思想、情绪和行为，以及个体间的互动与共享意义的形成。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入场”，即站在组织行动者的立场进入其所在的生活世界中，成为参与式观察者，深入理解、构建、诠释，阐述对行为和语言的理解。

由于意义建构具有感知的整体涌现性与生成性，维克主张以互为主体的方式，寻求具有洞见性的意义与解释，因而后续研究大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于管理实践中的真实体验，难以通过基于还原论的狭义实证主义范式捕捉，而质性研究具有深入情境的特点，重视体验在具体情境中的意义（韩巍，2011），更符合意义建构视角的初衷。具体而言，以往学者采取案例研究、扎根理论、民族志等方法。也有学者尝试使用替代变量测量意义建构，如 Fiss 和 Zajac（2006）将意义建构定义为环境扫描、解释和行动三个维度，通过问卷调查法检验意义建构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

四、讨论与展望

（一）局限与挑战

经过多年的发展，意义建构这一概念已经

较为成熟，并逐渐发展成为研究视角，但相关研究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意义建构常受到的批评是与宏观制度脱节（Weber & Glynn, 2016）。尽管意义建构侧重于个体层面的微观研究，但意义建构和制度理论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事实上，制度环境是意义建构的必要部分，组织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环境（Weick et al., 2005）。有学者开始尝试链接意义建构与宏观制度理论。例如，Weber 和 Glynn（2016）试图将宏观制度环境整合到意义建构理论中，确定了制度背景影响意义建构的三种机制——启动、编辑和触发，认为意义建构是制度化的基石，制度是意义建构的原材料。此外，Lu（2017）提出了制度化意义建构模型，发现组织的制度化程度对危机应对中不确定性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其二，对情感与身体的重视尚且不足。认知主义注重理性的作用，聚焦于认知决策过程（Glynn & Watkiss, 2020），而基于话语分析的学者重视语言的作用，同样也忽视了认知与语言以外的因素（Sandberg & Tsoukas, 2015）。正如 Meziani 和 Cabantous（2020）指出的，身体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仍处于缺失状态，维克对此做出了回应，反思何以忽略了身体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他想起一位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档案员协助他整理文献时的评价——“理论家倾向于在大脑中工作”。维克也回忆起构思和写作意义建构文章时在图书馆工作的场景（Weick, 2020）：

“当我整天沉醉地坐在（图书馆）无法移动的书桌前，小心地抬起又放下椅子，前倾又后仰，凝视窗外真实的世界，抓起又放下笔，

拿起3×5张卡片。在这一过程中，对身体在意义建构中扮演的角色，我很难提起兴致。这并非要轻视伏案工作或身体，而只是将二者置于情境之中。”

“Sense”本来的含义是指感觉器官通过视、听、嗅、尝、觉感受到色、声、香、味、触，也指判断力、意义。丰富的感官信息为决策与行动提供了重要基础，例如有经验的牧羊人通过看天色、闻气味、感受风速温度等自然条件，便可判断出天气变化的趋势。感官通道、情感、身体等整体性的感受在个体面临突发事件时的决策与反应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目前基于意义建构视角的经验研究仍停留在认知层面，将 sense 等同于 meaning，侧重于抽象的意义建构。在对突发事件等计划外的决策与行为应对研究中，有待系统挖掘情感、身体等因素的作用。后续研究可关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认知、情感和身体的相互作用，探讨非语言线索、特定感官信息对意义建构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紧急救援中心的电话接线员仅能依靠语音表达的内容判断紧急情况，削弱了突发情况下意义建构的效率和效果，而求救者的情绪表达与其所处环境的声音都提供了意义建构的线索，有助于接线员更为全面、快速地加工求救情境（Svensson & Hallgren, 2018）。

在研究方法上，可通过视频、音频等多感官通道收集数据，分析身体动作姿态、情绪表达、与他人的互动等在意义建构中的作用（De Rond et al., 2019）。有学者提出有必要重视视频信息在访谈研究中的应用，以全方位考察视觉层面的具身行为对理解访谈内容的影响（Olinger, 2020）。由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广泛应用于管理实践，直播营销、云旅游、远程会议等场景越来越普遍，听觉加上视觉线索为分析意义建构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来源与研究空间。

其三，在人际层面，以往基于意义建构衍生出的一系列概念（如意义赋予、意义交换）也是从认知层面出发，将“意义建构”中的“意义”（sense）界定为可沟通的、传递的内容，探讨意义的传递过程与机制。这一系列文献也忽略了情感、身体等非认知信息、无意识感知的生成与传导，可以推断这些研究也是基于笛卡尔主义的身心二元论立场。可见，对意义建构视角的全面理解及其哲学立场的阐释是十分必要的。正如 Sandberg 和 Tsoukas（2015）指出的，意义赋予者同时也是意义建构者，反之亦然，两者难以完全区分开来。现象学取向的认知科学家意识到这一区分的重要性，进而提出“参与式意义建构”（Participatory sense-making）（Di Paolo et al., 2010），特指行动者与他人进行互动、转化的意义建构过程，包括个体与他人之间的情绪感染、身体姿势以及语音语调等方面的协调（何静，2017）。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情感与身体体验如何在人际互动中影响意义建构过程。

（二）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

意义建构为深入描述、解读我国本土管理情境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我国管理学者韩巍（2017）提出情境研究的重要性，认为情境并不是外部存在的“客观事实”，而是个体主观建构的体验与感受。意义建构与具体情境密切相关，是个体构建情境、应对情境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重要途径。目前意义建构的研究大多在西方

情境下开展，在我国仅有少数研究探索本土情境下的意义建构特点与模式。韩玉兰（2010）探讨了我国中层管理者的意义建构模式，并将其概念化为管理觉知，包括敏察、覃思和慎行三个维度，表现为谨慎定义问题、对问题发生的背景保持敏感、主动搜寻与问题相关的信息，以及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尚航标等（2014）以我国国有林业局为研究对象，关注在政府“全面禁止国有林区树木砍伐”的政策变动下，林业局对混乱战略环境的意义建构过程及影响因素，构建了企业意义构建过程的五阶段模型。熊文明等（2021）基于意义建构-意义赋予的视角，通过多案例研究考察学术创业者的创业过程，挖掘创业的阶段性及其微观过程。

作为一名美国学者，维克的思想带有东方文化的色彩，无论是意义建构的生成、涌现等动态性、对模糊性的高度容忍度，还是在理解中讲出合情合理的故事时的想象与留白，都具有整体性、一元论的意味。此外，维克提出的即兴发挥（Weick et al., 1973）、正念（Weick et al., 1999）等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运用直觉和想象等特点具有内在一致性（李平，2016）。由于意义建构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相呼应，如何植根于中国情境，采用意义建构的视角研究管理实践，对发展本土管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除了从方法论上把握多元的研究范式，进一步厘清概念与理论背后的认识论基础，对于系统、准确地应用意义建构视角来考察本土管理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22年1月3日

接受日期：2023年5月11日

接受编辑：赵雁飞

作者简介

蔡崧吟，硕士毕业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中山大学旅游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成果曾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目前的研究兴趣为组织文化、危机管理、管理研究哲学等。

刘潇肖（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成果曾发表于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和《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管理学、心理学领域核心期刊。研究兴趣为文化与商业伦理、可持续饮食与消费的微观基础。

参考文献

- [1] 鲍勇剑：《管理“意料之外”：建立应对动荡环境的牢靠组织——管理大师卡尔·维克专访》，《清华管理评论》，2016年第11期。
- [2] 车晨、成颖、柯青：《意义建构理论研究综述》，《情报科学》，2016年第34期。
- [3] 郭海燕、张连营、洪帅、黄珊珊：《知识领导力视角下亲社会化意义建构机制对知识隐藏意愿的影响》，《管理学报》，2020年第17期。
- [4] 韩巍：《管理研究认识论的探索：基于“管理学在中国”专题论文的梳理及反思》，《管理学报》，2011年第12期。
- [5] 韩巍：《情境研究：另一种诠释及对本土管理研究的启示》，《管理学报》，2017年第14期。
- [6] 韩玉兰：《中国情境下的意义建构：中层管理

者的管理觉知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7] 何静：《生成的主体间性：一种参与式的意义建构进路》，《哲学动态》，2017年第2期。

[8] 胡玲、金占明：《两种战略观：实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年第7期。

[9] 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 卡尔·韦克：《理论开发之旅：以“意义建构”为主题和源泉》，载肯·史密斯、迈克尔·希特主编：《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 李平：《不确定性时代呼唤“非理性”——维克思想与道家哲学的不期而遇与不谋而合》，《清华管理评论》，2016年第11期。

[12] 林海芬、苏敬勤：《基于不同组织情境的意义建构研究评述》，《管理学报》，2013年第10期。

[13] 刘一弘：《危机管理的意义建构——基于“甲流”事件的政府话语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14期。

[14] 罗珉：《基于哲学视角的组织隐喻研究前沿探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31期。

[15] 齐丽云、汪瀛、吕正纲：《基于组织意义建构和制度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演进研究》，《管理评论》，2021年第33期。

[16] 尚航标、黄培伦、田国双、李卫宁：《混乱环境中企业战略决策的意义建构过程解析——两个林业局的对比案例研究》，《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4年第7期。

[17] [美] 塔利斯·R.B.：《杜威》，彭国华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8] 熊文明、余维新、陈传明：《基于意义建构—意义给赋理论的学术创业过程研究》，《管理学报》，

2021年第18期。

[19] 臧志、沈超红:《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语言的构建》,《管理学报》,2011年第8期。

[20] 曾荣光:《管理研究哲学》,任兵、袁庆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21] Ancona, D. 2012. *Sensemaking: Framing and Acting in the Unknown*. The handbook for teaching leadership: Knowing, doing, and being.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2] Balogun, J., & Johnson, G. 2004.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middle manager sense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7 (4): 523-549.

[23] Barasa, E., Mbau, R., & Gilson, L. 2018. What is resilience and how can it be nurture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7 (6): 491-503.

[24] Basu, K., & Palazzo, G. 2008.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Process Model of Sense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3 (1): 122-136.

[25] Calvard, T. S. 2015. Big dat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sensemaking: Theorizing interpretive challenges under conditions of dynamic complexity. *Management Learning*, 47 (1): 65-82.

[26] Combe, I. A., & Carrington, D. J. 2015. Leaders' sensemaking under crises: Emerging cognitive consensus over time within management team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6 (3): 307-322.

[27] Cornelissen, J. 2012. Sensemaking under pressure: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roles and social accountability on the creation of sense. *Organization Science*, 23 (1): 118-137.

[28] Cunliffe, A., & Coupland, C. 2012. From hero to villain to hero: Making experience sensible through em-

bodied narrative sensemaking. *Human Relations*, 65, 63-88.

[29] Davis, E. B., Kimball, C. N., Aten, J. D., et al. 2018. Religious meaning making and attachment in a disaster context: A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study of flood survivor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14 (5): 659-671.

[30] De Rond, M., Holeman, I., & Howard-Grenville, J. 2019. Sensemaking from the body: An enactive ethnography of rowing the Amaz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2 (6), 1961-1988.

[31] Di Paolo, E. A., Rohde, M., & De Jaegher, H. 2010. *Horizons for the Enactive Mind: Valu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lay*. In Stewart, J., Gapenne, O., & Di Paolo, E. (Eds.). *Enaction: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Cognitive Science* (pp. 33-8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2] Drazin, R., Glynn, M. A., & Kazanjian, R. K. 1999. Multilevel theorizing about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4 (2): 286-307.

[33] Eisenberg, E. 2006. Karl Weick and the aesthetics of contingency. *Organization Studies*, 27 (11): 1-15.

[34] Fischer-Preßler, D., Schwemmer, C., & Fischbach, K. 2019. Collective sense-making in times of crisis: Connecting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with Twitter user reactions to the Berlin terrorist attac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0: 138-151.

[35] Fiss, P. C., & Zajac, E. J. 2006. The symbolic management of strategic change: Sensegiving via framing and decoupl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9 (6): 1173-1193.

[36] Gephart, R. P. 1993. The textual approach: risk

and blame in disaster sense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 (6): 1465–1514.

[37] Gephart, R. P., Topal, C., Zhang, Z. 2010. *Future-oriented Sensemaking: Tempora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Legitimation*. In Hernes, T., & Maitlis, S. (Eds.). *Process, Sensemaking, and Organizing* (pp. 33–8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8] Gililand, S. W., & Day, D. V. 2000. *Business Management*. In Durso, F. T. (Eds.). *Handbook of Applied Cognition* (pp. 315–342). New York: Wiley.

[39] Gilstrap, C. A., Gilstrap, C. M., Holderby, K. N., et al. 2015. Sensegiving, leadership, and nonprofit Crises: How Nonprofit Leaders Make and Give Sense to Organizational Crisi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7 (6): 2787–2806.

[40] Gioia, D. A., Thomas, J. B., Clark, S. M., et al. 1994. Symbolism and strategic change in academia: The dynamics of sensemaking and influe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5 (3): 363–383.

[41] Gioia, D. A., & Chittipeddi, K. 1991.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in strategic change initi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2 (6): 433–448.

[42] Gioia, D. A., & Thomas, J. B. 1996. Identity, image, and issue interpretation: Sensemaking during strategic change in Academia.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1 (2): 370–403.

[43] Glynn, M. A., & Watkiss, L. 2020. Of organizing and sensemaking: From action to meaning and back again in a half-century of Weick's theoriz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7 (7): 1–24.

[44] Guiette, A., & Vandenbempt, K. 2013. Exploring team mental model dynamics during strategic change implementation in profession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A sense-

making perspective.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31 (6): 728–744.

[45] Hart, P. T. Symbols, rituals and power: The lost dimensions of crisis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1993, 1 (1): 36–50.

[46] Hill, R. C., & Levenhagen, M. 1995. Metaphors and mental models: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in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1 (6): 1057–1074.

[47] Klein, G., & Eckhaus, E. 2017.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as predicting organizational crisis. *Risk Management*, 19 (3): 225–244.

[48] Kornberger, M., Leixnering, S., & Meyer, R. E. 2018. The logic of tact: How decisions happen in situations of crisis. *Organization Studies*, 40 (2): 239–266.

[49] Langley, A., Smallman, C., Tsoukas, H., & Van de Ven, A. 2013. Process studies of change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Unveiling temporality, activity, and flow.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6 (1), 1–13.

[50] Laroche, H. 1995. From decision to action in organizations: Decisionmaking as a social represent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6 (1): 62–75.

[51] Lockett, A., Currie, G., Finn, R., et al. 2014.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position on sensemaking about organizational chang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4): 1102–1129.

[52] Lu, X. 2017. *Managing Uncertainty in Crisis: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Springer.

[53] Mafabi, S., Munene, J. C., & Ahiauzu, A. 2013. Organisational resilience: Testing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creative climat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3 (1/2): 70–82.

[54] Maitlis, S. 2005.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Or-

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8 (1): 21–49.

[55] Maitlis, S., & Christianson, M. 2014.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Taking stock and moving forward.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8 (1): 57–125.

[56] Maitlis, S., & Sonenshein, S. 2010. Sense-making in Crisis and Change: Inspiration and Insights From Weick (1988).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7 (3): 551–580.

[57] Meziani, N., & Cabantous, L. 2020. Acting intuition into sense: How film crews make sense with embodied ways of know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7 (7): 1384–1419.

[58] Monin, P., Noorderhaven, N., Vaara, E., et al. 2013. Giving sense to and making sense of justice in postmerger integr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6 (1): 256–284.

[59] Näslund, L., & Perner, F. 2012. The appropriate language: Dominant stories as a source of organizational inertia. *Human Relations*, 65 (1): 89–110.

[60] Olinger, A. R. 2020. Visual embodied actions in interview-based writing research: A methodological argument for video. *Written Communication*, 37 (2): 167–207.

[61] Pratt, M. G. 2000.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ambivalent: Managing identification among Amway distributor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5 (3): 456–493.

[62] Ran, B., & Duimering, P. R. 2007. Imaging the organization: Language use i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claims.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21 (2): 155–187.

[63] Ran, B., & Golden, T. J. 2011. Who Are W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sense-exchanging.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43 (4):

417–445.

[64] Rouleau, L. 2005. Micro-practices of strategic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How middle managers interpret and sell change every da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42 (7): 1413–1441.

[65] Sandberg, J., & Tsoukas, H. 2015. Making sense of the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Its constituents, limit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6 (1): 6–32.

[66] Starbuck, W. H., & Milliken, F. J. 1988. Challenger: Fine-tuning the odds until something break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5 (4): 319–340.

[67] Svensson, M., & Hallgren, M. 2018. Sense-making in sensory deprived settings: The role of non-verbal auditory cues for emergency assessment.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36: 306–318.

[68] Thomas, J. B., Clark, S. M., & Gioia, D. A. 1993. Strategic Sensemaking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Linkages among Scanning, Interpretation, Action, and Outcom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 (2): 239–270.

[69] Thomas, J. B., Sussman, S. W., & Henderson, J. C. 2001. Understanding “strategic learning”: Linking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sensemak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12 (3): 331–345.

[70] Vaara, E., & Monin, P. A. 2010. Recursive perspective on discursive legiti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ction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21 (1): 3–22.

[71] Weber, K., & Glynn, M. A. 2016. Making Sense with Institutions: Context, Thought and Action in Karl Weick’s Theory. *Organization Studies*, 27 (11): 1639–1660.

[72] Weick, K. E., & Bougon, M. G. 1986. Or-

organizations as Cognitive Maps: Charting Way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In Sims Jr, H. P., Gioia, D. (Eds.). *The Thinking Organization* (pp. 102 – 135).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73] Weick, K. E. 196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74] Weick, K. E. 1976.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oosely coupled syste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1: 1–19.

[75] Weick, K. E. 197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76] Weick, K. E. 1985. Cosmos vs. chaos: Sense and nonsense in electronic contexts.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4 (2): 51–64.

[77] Weick, K. E. 1988. Enacted sensemaking in crisis situa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5 (4): 305–317.

[78] Weick, K. E. 1990. The vulnerable system: An analysis of the tenerife air disaster. *Journal of Management*, 16 (3): 571–593.

[79] Weick, K. E. 1993. The collapse of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The Mann Gulch Disast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8 (4): 628–652.

[80] Weick, K. E. 1995.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Sci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81] Weick, K. E. 2012. Organized sensemaking: A commentary on processes of interpretive work. *Human Relations*, 65 (1): 141–153.

[82] Weick, K. E. 2016. 60th Anniversary Essay: Constrained comprehending: The experience of organizational inqui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1 (3): 333–346.

[83] Weick, K. E. 2020. Sensemaking, organizing, and surpassing: A handoff.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7 (7): 1420–1431.

[84] Weick, K. E., Gilfillen, D., & Keith, T. 1973. The effect of composer credibility on orchestra performance. *Sociometry*, 36: 435–462.

[85] Weick, K. E., Sutcliffe, K. M., Obstfeld, D. 1999. *Organizing for high reliability: Processes of collective mindfulness*. In Staw B. & Sutton, R.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pp. 91 – 123). Greenwich, CT: JAI, 21.

[86] Weick, K. E., Sutcliffe, K. M., & Obstfeld, D. 2005. Organizing and the Process of Sensemak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16 (4): 409–421.

[87] Whiteman, G., & Cooper, W. H. 2011. Ecological sense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 889–911.

[88] Wolbers, J., & Boersma, K. 2013. The Common Operational Picture as Collective Sensemaking.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1 (4): 186–199.

[89] You, M., & Ju, Y. 2019. Salience of public leaders’ “meaning making” in news coverage of a health crisis.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7: 400–405.

A Review on the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by Karl Weick

Cai Songyin¹ Liu Xiaoxiao¹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Purpose: The fast-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zation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Sensemaking,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by Karl Weic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individuals, teams and organizations during changes with high uncertainties. Previous research using a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attempts to break the constraint of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s on organizational theory. This research stream not onl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meaning and action, but also prompts us to reflect on the dynamic issues of activities, timeliness and flow in managerial practices. Although sensemaking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this construct and its underlying philosophical roots remain to be clarified. First of all, the translation of “sensemaking” in Chinese, literally as “meaning construction”, may induce misunderstanding and undermin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application of the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in future studies. Secondly, Weick did not explicitly clarify the philosophical stance of sensemaking in his works on sensemaking.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philosophical stances of sensemaking, and to explore the often-neglected role of body and experience in sensemaking.

Approach: This paper conducts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and related concepts. We also explore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analyze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stances of sensemaking.

Findings: First of all, Weick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sensemaking into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shifting the focus of research from stat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o dynamic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Sensemaking is a complex and continuous enactive activity through interpretations, actions, interactions and identity, which is triggered by ambiguous events or environments. Weick emphasizes that a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ensemaking and believes that actions can precede meaning, which overturns the idea that plans precede actions, and emphasiz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organization rather than the static structure. Secondly, Weick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John Dewey’s empiricism, which attempts to break down the division between internal elements and external representations under dualism.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sensemaking and its evolution, this study argues that sensemaking is based on nominalist ontology, subjectivist epistemology, and hermeneutic

A Review on the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by Karl Weick

methodology: (1) Nominalism assumes that there is no reality separating from individuals' mind and life world can be different across individuals. In a similar vein, Weick (1979) suggests that reality is socially constructed and environment are created by individuals themselves. As such, we postulate that sensemaking can be rooted in nominalist ontology. (2) Sensemaking focuses on explaining individuals'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reality, and thus indicates a subjectivist position in epistemology. (3) Considering the enactive nature of sensemaking, Weick advocates seeking insightful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in a mutually subjective way, and most of the follow-up studies adopt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model of sensemaking and organization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n Weick's mindset, which ignores the role of emotion and body in sensemaking.

Valu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sensemaking by reviewing Weick's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and it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underlying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paving the way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sensemaking. This paper also discuss the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on sensemak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research, indicating the absence of the role of body and experience in research on sensemaking.

Implications: Firstly, future research c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link between sensemaking and macro-institutional theor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sensemaking, and organization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Secondly, previous research ha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holistic feelings of sensory channels, emotions, and body in the process of sensemaking that often play important role in individuals' decision making and responses in unexpected events. Future research can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body and experience in the sensemaking. Thirdly, sensemaking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describing and interpreting indigenous managerial phenomena in China. Since the idea of sensemaking echo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w to examine management practices by adopting the sensemaking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theory.

Key Words: sensemaking; enactment; body; Karl Weick